

王弘海与利玛窦首次进京

李君明¹, 杨 权²

(1.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 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进京的西方传教士; 而广东籍的南都南京的礼部尚书王弘海, 则是利玛窦此次北上的策划者与引导人。此次北京之行虽未能使利玛窦实现其接触神宗皇帝的目的, 但为他后来的成功居京打下了基础, 意义堪称重大。精神的投契与旨趣的相合是王弘海与利玛窦结交的基础, 帮助朝廷修订历法是作为朝廷高官的王弘海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浅层动机, 帮助利玛窦传教则是作为准天主教徒的王弘海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深层动机。他对自己策划和帮助利玛窦进京一事讳莫如深, 既是想维持其高官地位, 也是想在对外战争的背景下避免“里通外国”的嫌疑。

【关键词】王弘海; 利玛窦; 天主教; 北京

明代嘉靖以来, 曾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先后来华传教, 而意大利人利玛窦是第一位扎根中国内地并首次成功进入明朝京师北京的传教士, 这一点众所周知; 但鲜少有人注意, 广东省琼州府(今属海南)籍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 是利玛窦首次进京的策划者和引领人。

利玛窦和王弘海, 一位是西方的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一位是中国明朝的士大夫, 本来“风马牛不相及”, 是什么机缘, 把他们二人连结在一起了呢?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 1610), 字西泰(一说畸人)^[1], 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a)省马塞拉塔(Macerata)城人, 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士。1581年, 利玛窦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之命, 从印度来中国传教。《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里亚传》载: “至万历九年(1581——作者注), 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 抵广州之香山澳。”所谓“香山澳”, 即系当时广州府香山县所辖之澳门。在澳门经过一年多的语言熟悉及其他准备之后, 他与另一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一起进入了广东肇庆, 在中国内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会所。后来他离开肇庆, 移地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传教。万历二十六年(1598), 他在王弘海的引领下成功进入北京, 使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触角伸入到了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万历三十八年(1610), 他在北京病逝。他逝世之后, 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根据利玛窦晚年所作的笔记手稿, 并参考其他资料, 用拉丁文写成了《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 对王弘海与利玛窦的结交并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经过, 有翔实的记载。

王弘海(约1541—约1617), 字绍传, 广东省琼州府定安县(今属海南)人, 世称忠铭先生。他十三岁中秀才, 明嘉靖四十年(1561)以弱冠之年解元, 四年后中进士。隆庆四年(1570)授翰林院检讨, 万历十一年(1583)升南京国子监祭酒, 十七年(1589)任南京礼部尚书, 十九年(1591)告休回籍。万历二十二年(1594)复起, 后因未见重用而乞休, 得旨致仕。大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逝世。著有《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集》, 今存世。

对照《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集》卷首所附区大伦撰《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与《利玛窦中国札记》两种中西文献, 可悉王弘海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与利玛窦结识的, 地点在广东韶州, 即今日的韶关。此年, 王弘海因仕途不顺心, 在南京礼部尚书任上“再疏告休, 得旨回籍”^[2]。当王弘海乘官船路过韶州时, 适逢利玛窦在韶州传教。王弘海过境前, 早已“从这样或那样的渠道, 听说过外国教士(即利玛窦)所表现的奇迹”^{[3]191}, 这位“从来没有离开他所乘的豪华船只登岸去做正式拜访的习惯”^{[3]191}的二品大员于是舍舟登岸, 专程前往教堂拜访利玛窦。为了发展传教事业, 利玛窦向来喜欢与中国士大夫及社会名流交往, 对王弘海的来访自然十分欢迎。二人相见甚欢, 王弘海“跟他们(指利玛窦及其助手)差不多谈了一整天, 而且他十分大方地不仅表示友谊, 还赠送贵重礼品”^{[3]191}。大概是意犹未尽, 第二天利玛窦又专程到王弘海停泊在江上的官船回访, “他在船上受到甚至超出他所预期的尊敬而又客气的接待”^{[3]191}, 二人谈锋甚健, 一直聊到深夜。韶州城里一来一往的会见, 使两位本来素昧平生的中西士人结下了友情。利玛窦这位“泰西儒士”表现出来的宽容精神与渊博学识, 让王弘海欣赏不已; 而王弘海所具

有的缙绅风度,也给利玛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会面中,王弘海向利玛窦承诺,可在适当时候把他引进北京。信守承诺的君子王弘海后来果真履行了这一承诺。

王弘海与利玛窦分别之后,就沿北江南下,回到了海南。他的“告休回籍”,说白了是被迫辞职,不过王弘海并没有从此告别官场。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了“壬辰倭乱”,企图吞并中国的属国朝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明朝出兵援朝,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援朝抗日战争。由于战争初期战局不利,朝廷召回了部分在籍的官员,王弘海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东山再起^[2],官复原职(区传记为“甲午”即万历二十二年,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有四年的出入,兹从《札记》)。这一年他离琼北上,当他过韶州时,利玛窦已移地江西南昌府传教,所以在韶州他只见到了利玛窦专留在这里等候他到来的助手、意大利人郭居静(Lizaro Catfino),并在在郭居静的陪同下来到了南昌。王弘海、利玛窦两位老友在时隔七年之后在南昌再度相会,自然欣喜不已。也许是对三年前王弘海在韶州赠礼的回报,在这次见面中利玛窦送了王弘海一块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玻璃三棱镜。正好王弘海有意于要到北京疏通关节,以谋求“入阁”,他笑对利玛窦说这块三棱镜可成为“垫脚石”。在交谈中王弘海了解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曾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的官员之子治病而到过南京,但未能在南京站稳脚跟。王弘海获悉这一情况之后,答应这次可陪利玛窦等再赴南京。不仅如此,王弘海还主动提出,愿意利用自己不久将代表南京的六部官员去北京参加神宗皇帝的万寿圣节庆典(明神宗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十七日(西历9月17日),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正是其三十五大寿)的机会,把利玛窦引入北京。王弘海的提议,自然使利玛窦大喜过望。

1598年7月4日,王弘海等与利玛窦、郭居静一起乘船离开南昌,前往南京。在旅途中,利玛窦又送给王弘海一座非常名贵的时钟,并教会了他开启和调整的方法。羁旅给利玛窦接触王弘海家人带来了某种便利,利玛窦力图“同王大人全家、仆人、儿子,尤其是其舅父姓晁者,搞好关系”^{[3]240}。利玛窦的努力似乎很奏效,王弘海的一个儿子在利玛窦的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主动接受洗礼,成为了教徒,教名“保罗”。这个“王保罗”,后来于崇祯五年(1632)到澳门把外国传教士请进海南,开启了天主教在岛内传播的先河。^{[5]42}

王弘海和利玛窦一行抵达南京后,发现形势有点不对头。由于抗倭的关系,南京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官府在城里实行了严格的戒备措施,严禁窝藏任何有嫌疑的人。利玛窦身为外国人,自然在“有嫌疑”者之列。这种形势

使王弘海这个二品大员也不无慌张,“生怕有人控告他秘密带进了外国人”。当时“没人敢于接待神父们,他们被留在小船里,天气酷热又没有任何保护”。利玛窦曾“好几次进城拜望尚书,但总是乘着遮起来的轿子;而且即使以这种方式他也不能旅行,除非是向驻军司令通知他的到来”^{[3]225}。“驻军司令”甚至曾派兵捉拿他,但当知道他是礼部尚书的好友之后又把他放了。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王弘海到南京后不久即从陆路出发北上,而没有与利玛窦同行。过了十天,利玛窦才在王弘海的好友、南京的“总督”(实为应天巡抚)赵可怀的资助下,和王弘海的家人及差役一起,登上了沿运河北上的“快马船”。

利玛窦及其随从于西历1598年9月7日(即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到达北京,这时上距他万历九年(1581)从印度来到澳门,已整整十七年!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这么久,才在王弘海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地进入大明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心情激动,自不待言。在自己的笔记中,利玛窦怀着劫后余生的心情,情不自禁地用大量笔墨记述了自己来到倾慕已久的大明之都的感受,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利玛窦是历史上第一位成功进入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他的进京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近代的西方文明正面碰撞与对接的标志,利玛窦也因此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而王弘海在利玛窦进京这一重大事件中,充当了策划者与引路人的角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王弘海,就不会有利玛窦的这次进京。

利玛窦甫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与已从陆路先期到达的王弘海联系。既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方便,王弘海让利玛窦住进了自己在城内的私家府第,而随从利玛窦进京的郭居静等人则居住在王弘海的郊区别墅。进入了北京的利玛窦十分希望有机会觐见神宗皇帝,王弘海答应尽可能利用自己的关系来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他找到了自己所熟识的一位宫中太监,希望他代为转递利玛窦给皇帝的奏章。这位太监表示可以考虑帮忙,不过他说在转递奏章之前,最好让他先看看利玛窦送给皇帝的礼物。于是王弘海在约定的日子里陪同他来到了自家的郊外别墅,与他一起观看了利玛窦准备贡献给皇帝的自鸣钟、耶稣十字架受难像、圣母像、八音风琴以及玻璃三棱镜等奇珍。这位太监原先听说传教士有把水银变成真银的魔力,当他了解到这其实是误传之后,就变了卦。“他告诉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他不能代表外国人向皇帝进言,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他还向他们肯定说,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加分辨,认为他们全部相同,或者几乎相同,所以可能把神父们当做日本人”。由于同样的原因和友人的劝告,王弘海“也开始认识

到,使自己卷入外国人的事是很危险的”,他“对自己的努力感到绝望,所以想把神父们送回南京去”⁽³⁾²³⁵。为了不使进京的巨大劳动和开销白费,利玛窦等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月,想方设法希望能获得皇帝的接见,但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至同年11月初,眼见留京的期限已到,他们不得不黯然离开北京。后来利玛窦在王弘海的保护下在南京居住了下来,并以自己非凡的个人魅力逐渐征服了南京的社交圈。首次进入北京的利玛窦虽然未能实现觐见皇帝的目的,但此行使利玛窦积累经验,为他后来再次进京并成功在京居留打下了基础。

两年之后,1600年的5月18日,利玛窦等第二次从南京向北京进发,费尽周折,才于1601年1月24日(此日为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史·意大利传》记为“至二十九年入京师”,时间略有出入)第二次进入北京。利玛窦此次进京,王弘海已无法同行,因为前此一年,他已致仕南返。不过他在临行时“向他在北京的朋友们发了信,推荐神父们到首都去工作”⁽³⁾²⁶⁹,为利玛窦等最终留在北京传教出了一分力。从此之后,王弘海与利玛窦一南一北,天各一方,再未见过面。利玛窦这次进京,由于已无战争阴影的影响,且获得某些官僚和太监的帮助,终于顺利地把礼品送入了宫中。在利玛窦进贡的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中,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最为神宗皇帝所喜爱。由于当时宫内缺乏维护自鸣钟的专门技术人才,皇帝下旨,利玛窦每季进宫检查钟表一次。这样利玛窦就成了吃俸禄的御用钟表修理师,获得了出入紫禁城的特许,成功留在了北京。作为对利玛窦这位“恭顺”的泰西士人的回报,神宗皇帝“在宣武门内赐予传教士一处地面,建起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即现在的‘南堂’”⁽⁶⁾⁸⁵。利玛窦以其丰富的学识广泛结交明朝的士大夫,并以中文编撰新书,获得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并成功地使一部分人信奉了天主教。利玛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五月逝世于北京。本来,依照明朝惯例,客死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但利玛窦死后,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向神宗皇帝上奏,希望皇帝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中称: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照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愿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这一请求获得了神宗皇帝的批准,利玛窦被安葬在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这块墓地,后来成为明清以来的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场所。由利玛窦开辟的在华传教事业则历经百年而不衰,直至清康熙末期某些自负矜傲的传教士违背了“利玛窦规矩”,才遭受了重大挫折。

与利玛窦结交并把他引入北京,这在王弘海的人生经历中,无疑是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大事。可是奇怪的是,在王弘海留下的传世文字中,对这件事却只字未提;在散见于各种史乘、志书的王弘海传中,这件事也未留下痕迹!要不是利玛窦自己把它写入了札记中,这件事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荡然无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弘海与利玛窦会结下友谊?是什么动机使王弘海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为什么王弘海对自己与利玛窦的交往讳莫如深?

对第一个问题,虽然历史资料并没有提供正面的答案,但是从他们的个性特征与交往轨迹中似乎可以看出,是精神的投契与旨趣的相合促成了他们的接近。本来,王弘海与利玛窦,种族不同,社会角色亦大异,一个是罗马的耶稣会士,一个是中国的朝廷命官,无论是教育背景、文化观念还是思维方式、精神信仰,都距离甚远。但是这些差异并不一定成为二人订交的鸿沟。在王弘海认识利玛窦之前,利玛窦已在广东居留了十年。利玛窦本来就是一位西方硕学,对哲学、历史、科学、宗教等方面均有深厚的修养。16世纪的西方传教士,身上大都带有那种“绝对真理占有者”的夸张性格——热情、坚毅、不乏殉道精神,但也因为对非欧洲民族文化毫不妥协而显得僵直、教条、不近人情。与这些传教士不同,利玛窦从踏上中国领土的最初一刻开始,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若要使罗马的传教事业获得成功,就必须摒弃“欧洲中心论”,实行“文化适应主义”,适应东方的社会环境,尽可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当年他初到肇庆,并不是自称来自意大利而是自称来自“天竺”,并这样向中国官员解释来华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以至中国官员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他在肇庆建立的第一个传教基地,竟称“仙花寺”。在肇庆期间,他刻苦研习汉语,学习中国的文化。直至到了韶州之后,为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与士人交往,他才脱下僧衣,蓄发留须,穿起了儒士的服装。利玛窦不仅穿衣打扮与一般中国人无异,而且在内心中对中华文明亦由衷赞叹。他觉得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中国的传统典籍《四书》,就是由他在韶州首次译

成拉丁文的。关于这一点，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一译约翰·保罗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谓公正：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远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7]

利玛窦的博学卓识，尤其是他尊重中华文化的态度，为他赢得了中国士人的尊重，其美名一传十、十传百，连远在南都的王弘海亦有所闻。正是利玛窦的良好声望，使王弘海纡尊降贵，在路过韶州时主动登门拜访了他。

至于王弘海本人，虽贵为南都的礼部尚书，但从其传记资料与仕履历程看来，似乎还算得上是一位保持了士人风骨的知识分子。其本传称：“江陵（内阁首辅张居正——作者注）当国专恣……，公作《火树篇春雪歌》讥焉。……江陵闻而衔之。会赵、吴两翰林疏论江陵构祸，公为救解。江陵愈怒，思以蜚之。……公在馆十四季，始转司业。十八季，江陵败，乃晋春坊。”^[2]后来虽然官升至南都的礼部尚书，但有职无权（南京的六部机构自成祖迁都北京后便成了徒具虚名的中央行政机构），而在这样的处境，他也不怎么见宠于朝廷。正唯其如此，他才不得不在任上“告休回籍”。这样一个物，当比那些官气十足的官僚自然更易于与利玛窦沟通。事实正是如此。俗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初次见面就谈了一整天，次日又从白天谈到黑夜，如果不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话可聊？因此我们相信，二人初会，定有相见恨晚之慨。特别是王弘海，利玛窦的人格魅力一定深深征服了他。

至于王弘海把利玛窦引入北京的动机，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根据利玛窦本人的记载，王弘海主动提出要引领他人京，是想要他用西方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为朝廷修订历法服务。《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利玛窦在初会王弘海的时候，曾向王弘海谈及一些数学问题的解法，并向王弘海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的若干知识。这一点让王弘海很感兴趣，他因此对利玛窦说，将来倘有机会，“将把利玛窦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文学家不知怎样进行补救”。中国的历法是从上古时代发展起来的，春秋时代已出现《夏小正》一书，汉武帝时期实行了有完整资料记载的《太初历》，后来各代又出现了数十家

经过改进的历法，著名的有《乾象历》、《大明历》、《皇极历》、《大衍历》、《宣明历》、《统天历》、《授时历》等等。在王弘海生活的时代，明朝实行的是《大统历》。中国历法为太阴历，与西方的太阳历相比，在精确性方面有较大的差距，故需不时置闰来纠正误差。利玛窦广博的数学与天文知识给王弘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产生了带利玛窦进京参与历法修订的想法，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他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最初动机，想来也会是他后来果真这么做的时候对外宣称的理由。王弘海官居南京礼部尚书，本来就负有接待南方各省的外国人的责任，把有特殊知识与技艺的人带进朝廷为皇帝服务，是其职责所在。

不过，王弘海把利玛窦引入北京，还有更深一层的动机，这就是帮助利玛窦发展其传教事业。作为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进入紫禁城为明皇帝服务并不是利玛窦进京的真正目的——尽管他十分愿意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为皇帝服务，传播《圣经》中的教义、让更多的人皈依天主教才是他进京的真正目的。利玛窦雄心勃勃，他在写给罗马方面的信件中，甚至提出了进京后设法使中国皇帝也信奉天主教的计划。皇帝信服天主教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罗马方面对利玛窦进京充满了期待。在利玛窦进京前夕，罗马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曾特意任命他为中国传教团总督。《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范礼安特别向新监督（指利玛窦）建议的是，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在他看来，除非有某个人被皇帝欣然接受，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为了使利玛窦实现上述目的，他特意“搜集了他认为凡是有助于这个目标的所有物品，都送往南昌府”，为利玛窦准备了一大批贡品。显而易见，利玛窦的传教计划如果没有中国高层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本来利玛窦首先想到的靠山并不是王弘海，而是他在南昌结交的建安王，因为这位王爷在血统关系上与皇上最近。“然而，经过重新考虑，他肯定这种接近方式是无用的。他警惕到这样一个事实，皇帝不仅使他的亲属置身于公共生活之外，而且实际上还在防范他们，惟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接管他的帝位”。利玛窦放弃与建安王的接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毫无疑问不会对这个计划感兴趣”。而恰在此时，利玛窦获悉他的老朋友王弘海将要北上复官，王弘海便充当了替利玛窦穿针引线的角色。王弘海不仅与建安王的身份不同，对利玛窦进京传教的态度也不相同，他有能力也乐于帮助利玛窦。王弘海身为朝中的二品大员，为什么会这么不遗余力地帮助、支持利玛窦呢？道理很简单：在利玛窦的感化下，王弘海已成为了一名准天主教徒。这并不是臆测，而是有史实为证的。上文已经提到，《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王弘

海与利玛窦在韶州城初次见面就谈了几乎一整天。虽然对二人具体谈了些什么,利玛窦并没有记录下来,不过我们可以想见,作为传教士,利玛窦一定忘不了向王弘海灌输天主教义。而在利玛窦登船回访的时候,他们二人的确谈到了天主教的道理。王弘海告诉利玛窦,他从韶州府同知的口中知道利玛窦曾有过宽恕袭击过自己的强盗之举,利玛窦的宽仁行为使王弘海相信,“基督教义是难以理解的尽善尽美,他对这一点赞不绝口”。在后来的接触中,他进一步受到了利玛窦感化,最终成为了一位准教徒。我们可以举出的一个旁证是,王弘海的儿子——即教名为“王保罗”者,在利玛窦的引导下皈依了天主教。需知在“父为子纲”的封建时代,如果未获王弘海首肯,王保罗是不可能成为天主教徒的。其实要不是王弘海的多妻身份与天主教义的要求有冲突,他很有可能成为利玛窦发展的第一位高官教徒。根据《利玛窦评传》记载,王弘海的确对天主教产生了信仰。利玛窦说他“对我教就更有感情了,虽然始终由于某些很大的障碍(即娶妾)而不能入教”^{[4]287}。“敬鬼神而远之”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遵循的人生哲学,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志、心情苦闷而对宗教产生信仰,仕履并不很平坦的王弘海正属后者。在明代,像他这样信仰天主教的贵族或官僚其实并不在少数。在北京,受利玛窦影响而信奉天主教的有数百人,当中有数名是公卿大臣,包括后来影响很大的翰林徐光启和官至太僕寺少卿的李之藻。明永历二年(1648,清顺治五年),以永历帝的太后为首50余妃嫔、大员40人及多名太监受洗入教^{[8]154}。据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记载,连当时的重臣瞿式耜都皈依了天主教,不过瞿式耜自己在诗文中对此事只字不提。这一点与他的前辈王弘海颇为相似。把利玛窦引入北京来传教,是准天主教徒王弘海心中的秘密,他不会向人泄露。

至于王弘海为何对自己与利玛窦的交往讳莫如深,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方面因为王弘海是朝廷高官,如果让人知道自己与一位西方的传教士过从甚密,甚至在其的劝导下信奉了天主教,这显然对仕途不利;另一方面,在万历时期,东北地区的后金已崛起,日本在经营了多年之后妄图侵吞朝鲜并进犯中国,接踵而来的西方海盗则骚扰沿海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王弘海对自己把一位外国人潜入北京之事大肆张扬,会有被弹劾的危险,弄不好还会因“里通外国”而丢官失爵。王弘海可不这么傻!

不管如何,王弘海把利玛窦引领入北京,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值得今日大书而特书。这一事件,促进了西学东渐,使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初步了解了欧洲的宗教和科学技术;也促进了东学西渐,让欧洲人认识到了中华的地大物博、人文鼎盛,推动了西方的启蒙运动^{[9]1-26}。我们对王弘海在这一事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不应忘记的。

【参考文献】

- [1] 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2] 区大伦. 王弘海传[M]. //王弘海. 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编. 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 [3] 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4] 裴化行. 利玛窦神父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5] 章文钦. 澳门历史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6] 余三乐.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 [7] [2001-10-24]. <http://www.cathlinks.org/ricci400.htm>.
- [8]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9] 安田朴, 谢和耐. 明清间人华传教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Wang Hong - hui and Mattew Ricci Had Come to Beijing Firstly

LI Jun - ming¹, YANG Quan²

(1. Chinese Department, Yat -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Institute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Yat -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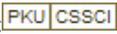
Abstract: In 1598, Roman Penitent Mattew Ricci came into Peking,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e of capital of Ming Dynasty, and then he became the first Hesperian priest who came into Peking successfully in the history. And the minister of the ceremony department of the southern capital Nanking Wang Hong - hui, whose native place was Guangdong, was the hatcher and leader of this affair. The journey could not realize his aim to contact Emperor Ming Shenzong, but it had laid ground of his subsequent inhabitancy in Peking successfully, therefore it was meaningful. The congenial spirit and the harmony taste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association, emending the calendar for the court was the exterior motive of Wang Hong - hui as a dignitary, and helping Mattew Ricci missionize was the deep motive of Wang Hong Hui as an unofficial Romanist, and Wang Hong - hui always kept secret in this event for his dignitary in one hand, and in the other hand he wanted to avoid the suspicion of the quisling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war.

Keywords: Wang Hong - hui; Mattew Ricci; come to Beijing firstly

【作者简介】李君明,男,副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长期从事明清文史研究,著有专著与论文多种。

【收稿日期】2007-03-30

王弘海与利玛窦首次进京

作者: [李君明](#), [杨权](#), [LI Jun-ming](#), [YANG Quan](#)
作者单位: [李君明, LI Jun-ming\(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杨权, YANG Quan\(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刊名: [图书馆论坛](#) 
英文刊名: [LIBRARY TRIBUNE](#)
年, 卷(期): 2007, 27(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9条)

1. [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1995
2. [区大伦](#) [王弘海传](#)
3. [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 2001
4. [裴化行](#) [利玛窦神父传](#) 1998
5. [章文钦](#) [澳门历史文化](#) 1999
6. [余三乐](#)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 2001
7. [查看详情](#) 2001
8.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2003
9. [安田朴](#). [谢和耐](#) [明清间人华传教士和中西文化交流](#) 199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sglt20070404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e3a6edb-5b30-4d2c-83f7-9e4d007f3bd4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